

臆想世界：明代犀牛的形象失真

Imaginary World: Image Distortion of Rhinoceros in Ming Dynasty

杨妍均 / YANG Yanjun 陈芳 / CHEN Fang

(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 北京, 100029)
(Academy of Fine Arts,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摘要: 商周时期, 犀牛曾生活在华夏平原地区, 但随着气候、人口等原因逐渐在北方绝迹, 其形象也开始失真。然而, 明代初期朝贡活动频繁, 宫廷曾多次获得域外贡犀, 但朝廷官员在极有可能见到真实犀牛的情况下, 所绘犀牛仍然出现失真现象。此外, 同时期不同类别文本中的犀牛图像完全不同, 存在颇多疑惑。本文从博物学角度剖析犀牛图像如何失真、为何失真以及谁使得图像失真等问题, 进而探讨图像中的“臆想世界”。

关键词: 图像失真 犀牛 明代 朝贡

Abstract: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rhinoceroses had lived on the plains of China before disappeared with the change of climate and population. As a result, the Chinese image of rhinoceroses began to be distorted.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rough the tribute activities, rhinoceroses from other countries were repeatedly obtain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officials of the Ming dynasty saw real rhinoceros, the image of rhinoceros might still get distorted at times. In addition, imag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texts might be completely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and why the rhinoceros images got distorted and who distorted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history, and in doing so it explores the “imaginary world” in the images.

Key Words: Image distortion; Rhino; Ming dynasty; Tribute

中图分类号: N91: S688.5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1.07.011

目前已知犀牛共五种, 分别为黑犀 (*Diceros bicornis*)、白犀 (*Ceratotherium simum*)、印度犀 (*Rhinoceros unicornis*)、爪哇犀 (*Rhinoceros sondaicus*) 和苏门答腊犀 (*Dicerorhinus sumatrensis*, 以下简称“苏门犀”), 其中黑犀和白犀生活在非洲地区, 另三种犀牛生活在亚洲。从考古遗迹来看, 犀牛曾生活在我国平原地区, 甚至是华北平原。在河南淅川下王岗、浙江余姚河姆渡、云南通海、广西南宁等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中都出土过犀类遗骸。另外, 安阳殷墟与汉代

西安南陵也曾发现过犀类遗骨。经综合分析, 这些犀牛均属爪哇犀和苏门犀,^[1]二者在外观上最显著的区别是苏门犀有一大一小前后两角, 爪哇犀仅有一角。印度犀也为独角, 体型较爪哇犀大, 亚洲犀牛中苏门答腊犀体型最小。

当前, 学界就犀牛曾生活在我国平原这一问题已基本达成一致, 而分歧在于“兕”是否是犀牛、犀牛的分布变化以及我国犀牛绝迹原因等问题上, 但因篇幅有限又非讨论重点, 故此类问题本文不予涉及。

基金项目: 教育部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抢救传承与设计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编号: NHFZ20190111)。

收稿日期: 2019年11月15日

作者简介: 杨妍均(1992-)女, 北京人, 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Email: ariesjun@qq.com

陈芳(1968-)女, 湖北襄阳人, 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物质文化研究。

一、明代以前的犀牛形像

从出土青铜器来看，西汉以前的人更为了解苏门犀的真实形貌。商代小臣觶犀尊出土于山东寿张县，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犀牛体态憨厚、头顶双角，造型较为写实。1963年，陕西兴平县曾出土一件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图1），此犀牛形象较前者更为逼真，双角尖锐，亦以苏门犀为原型。如若工匠未曾亲眼见到犀牛，即便有高超的制造工艺，也极难铸造出如此生动的器型。然而，历史总是充满谜题，河北平山县战国一号墓出土了一件错金银铜犀牛屏座（图2），此犀牛有三角，是已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角犀牛形象，三角犀非常罕见但并非没有。2015年12月31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游客吉普森（Jim Gibson）在非洲埃托沙国家公园（Etosha National Park）发现了一只三角黑犀牛，专家推断该犀牛多一角是因其其在母亲子宫内时出现细胞突变，这种情况通常四五十年才会出现一次。^[2]虽然黑犀牛生活在非洲，但我们无法断定亚洲犀牛不会出现



图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图2 战国错金银铜犀牛屏座

此种情况，因而无法确定这只铜犀牛的三角造型是“真实再现”还“艺术创造”。不过，学界基本确定汉代以后北方已难觅犀牛踪迹。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3]，p1254）《后汉书》之《肃宗孝章帝纪》载：“元和元年春正月，中山王焉来朝。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孝和孝殇帝纪》载：“六年春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4]，p-87）这些记载说明西汉时关中地区应该已无活犀，故王莽令他域进贡，以耀威德。

魏晋南北朝时期，博物风气大胜，博物君子们对文本中的犀牛饶有兴趣，纷纷进行了“演绎”。如郭璞对《尔雅》“犀，似豕”注曰：“形似水牛，猪头，大腹，庠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顶上，一在额上，一在鼻上。”^[5]此“三角”与战国中山王墓的三角犀牛相对应，或许郭璞曾见过三角犀牛形像。另需说明的是，汉晋时期猪尚未完全进化成今日家猪的样子，猪鼻较长猪头较小，具体形象可参见首都博物馆所藏的汉代陶质子母猪。此外，南北朝药学著作《本草经集注》云：“駭鸡犀者，以置米边，鸡皆惊駭不敢啄。又置屋中，乌鸟不敢集屋上。昔者有人以犀为麝，死于野中，有行人见有鸢飞翔其上，不敢下往者，疑犀为异，抽取便群鸟竞集。”^[6]此处“犀”即为“犀角”，古代犀角虽稀有却并非不可得，鸡、鸟是否惧犀一试便知，然而世《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书皆引此句，可见前代书写者对后代影响之深。因并未找到这一时期的犀牛图像资料，所以其形象并不明确。

唐高祖李渊献陵有一头雕刻较为逼真的独角犀石像，李渊死于贞观九年（635年），这头石犀应雕于此时。且该石犀座上刻有隶书铭文“（高）祖怀（远）之德”，^[7]《旧唐书》载贞观初年“林邑国遣使贡驯犀”，因之可以推定此物所记之事即为此，那么雕刻这尊石犀的工匠很可能亲睹过犀牛真容。但就目前已见的唐代犀牛图像看，多数图像存在失真情况（图3），犀角从两眼间上移至头顶，足部与体态更似牛羊，献陵石犀更像是“个例”。刘洪杰教授曾考察我国犀牛的历史分布北界，唐代时犀牛基本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图4）。在北方若想见犀牛应该只能通过朝贡渠道，但冬日

记述真元年间南海贡犀在北方受冻而亡事。唐代犀牛形象失真或许与北方罕见真实犀牛有关,但其具体原因可能更为复杂。

发展至宋代,犀牛图像已无犀牛之型,已见宋文本中犀牛均只有一角且位于头顶(图5)。现存各版本《说文解字》中对“犀”的解释基本一致,都称犀一角在鼻一角在顶,《说文解字》最早刻本为宋刻元修,故而不能确定该说法是否来自东汉许慎,但从唐代犀牛图像来看《说文解字》很可能在唐代就已有这种解释。在看不见真实犀牛的情况下,文字便成了后人认知其形象的主要来源,而前人的“误解”一旦被后人当做“知识”,那么误解就很难再解除了。

通过对中国早期犀牛形象史的梳理来看,汉代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犀牛在北方地区渐渐绝迹,犀牛形象也逐步失真,先是犀角错位,继而

体态变化,形象也越来越多样。

二、明代贡犀情况

明代犀牛活动区域退居西南地区,朝贡是宫廷获取活犀最佳途径。明朝初期,各地朝贡活动频繁,帝王通过朝贡制度对外进行安全防御,^[8]由《明实录》和《明史》可知洪武至嘉靖三年间明廷曾九次获得贡犀。而洪武廿一年,因朝贡次数过于频繁,明太祖谕令安南国三岁一朝,犀象之属勿再进,说明此前安南国曾进贡过犀牛,只是未记录在《明实录》和《明史》中。明初通事马欢曾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后一次为宣德六年(1431年),并于景泰二年(1451年)撰成《瀛涯胜览》,该书载:“黎代国(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山有野犀牛至多,王亦差人捕获,随同苏门答刺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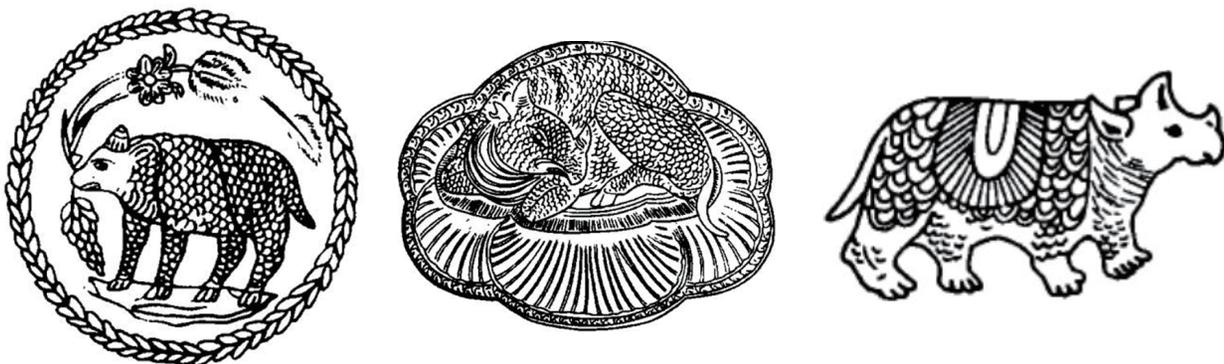


图3 唐代器物上的犀牛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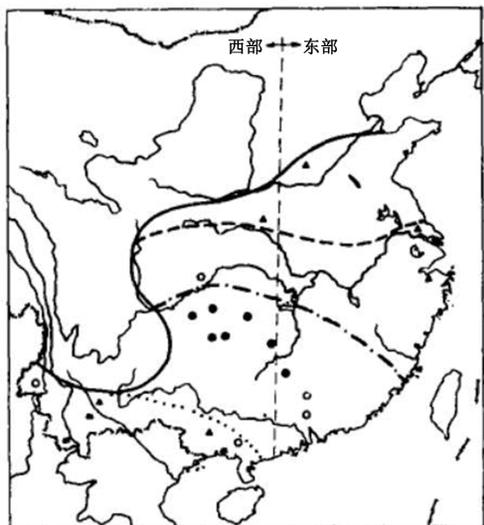


图4 中国犀牛分布区的变迁
 —— 殷商以前 ▲ 骨骼出土地点(商以前)
 - - - 春秋时期 ● 土贡犀角州郡(唐)
 - · - · 隋唐时期 ○ 记载犀牛州郡(唐)
 ····· 元明时期 ■ 发现犀牛地点(清末民初)



图5 宋代书籍中的犀牛形象

以进贡于中国”，（[9]，p-44）可见黎代国或苏门答腊国也曾进献过犀牛。所以，综合表1中文献而言明代朝廷至少先后十一次获得贡犀。

朝贡品是他国向明朝“臣服”的象征，明廷自然要悉心对待以示天朝上国之礼仪，对于活生生的贡犀更是如此。《大明会典·朝贡通例》规定：“凡进象、驼到于会同馆，令本馆喂伺，次日早进内府御前奏进。如候圣节、正旦、冬至，陈设进收日远，先行奏闻，象送驯象所、驼送御马监收养，至期令进内府陈设。”因而，文武百官在大节之时均有机会见到异国供奉的奇珍异兽，犀牛自不在话下。这段内容虽然没有直接说如何对待贡犀，但在《大明会典》、《明实录》等典籍中均将犀、象放在一起，对贡犀的处理方式应和象同。

三、明代犀牛的图像重构

明初虽有贡犀入内廷，但明代文本中的犀牛形象更为复杂，大致分为似牛、似鹿和似猪三类。

1. 似牛的犀牛图像

这类犀牛图像的最早版本绘于明朝初期，犀牛体态似牛，也较其它图像更为写实。图6中是今可见最早的明代犀牛图像，犀角位于鼻间，身有

鳞甲。该图来自《异域图志》，此书于1430年成书，1489年刊行，著作者很可能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1378-1448）。^[10]朱权十三岁被封为宁王，虽然两年后前往藩地大宁，后又被永乐帝改封于南昌，但他身为皇亲有机会见到真实的犀牛，或者比常人更有能力了解犀牛的真正面貌。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虽然《异域图志》所绘犀角位置正确，但犀牛却长了鸟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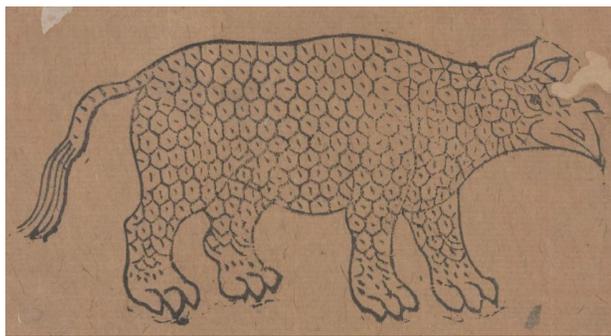


图6 明代《异域图志》中的“犀牛”插图

图7来自《本草品汇精要》，撰成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被意大利主教带回罗马，现藏于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图8出自《补遗雷公炮制便览》（1591年），与图7-C“胡帽犀”基本一致，《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书前手绘牌记“万历辛卯春制”，可知成书时间为1591年，

表1 明代犀牛进贡情况

时间		朝贡详情	出处
洪武十年八月	1377年	三佛齐国王麻那者巫里遣使贡犀牛、黑熊、火鸡、红绿鹦鹉、白猴。	《明实录》《明史·外国》
洪武廿一年十一至十二月	1388年	诏礼部咨谕安南国，令三岁一朝，方物随其所产，止许一人进送，其诚敬而已，犀象之属勿或再进，以重劳吾民。	《明实录》《明史·太祖本纪》
永乐二年七月至八月	1404年	占城国王占巴的赖遣使部该序罢尼来朝贡犀牛及方物。	《明实录》
永乐三年	1405年	（云南）永乐元年设乾崖长官司。三年，乾崖长官囊欢遣头目奉表贡马及犀、象、金银器，谢恩，赐钞币。	《明史·云南土司》
永乐五年六月	1407年	木邦军民宣慰使罕的法以朝廷遣使赉救赏劳，遣头目代扛零等来朝谢恩，贡象、马、犀牛、方物。	《明实录》
永乐七年	1409年	永乐二年以刀线歹为宣慰使，给之印……七年复进金银器、犀象、方物谢罪。	《明史·云南土司》
永乐七年八月	1409年	占城国王占巴的赖遣使部该济标等奉表贡犀、象。	《明实录》
永乐十七年九月	1419年	满刺加等十七国王亦思罕答儿沙等进金镂表文贡宝石、珊瑚、龙涎、鹤顶、犀角、象牙、狮子、犀牛、神鹿、天马、骆驼。	《明实录》
天顺四年五月	1460年	占城国遣陪臣究别陀朴等，陕西岷州高地平等簇番僧头目苍者他等，四川马湖府泥溪长官司土官社人王明德等，贡犀牛、象、马、方物。	《明实录》
嘉靖三年	1524年	鲁迷国贡狮子、犀牛。	《明史·世宗本纪》
不详	?-1451年	黎代国…山有野犀牛至多，王亦差人捕获，随同苏门答刺国以进贡于中国。	《瀛涯胜览·黎代国》

晚于《本草品汇精要》。此外,万历时期的《金石昆虫草木状》中也有三幅犀牛图,与图7三图基本相同,可知《本草品汇精要》《补遗雷公炮制便览》和《金石昆虫草木状》三者同源。又据学者研究《本草品汇精要》与《食物本草》在开本、板式、字体、画风等九个方面均相同,并推测《食物本草》成书更早,([11],pp.1-4)图9即是最好的例证。故《金石昆虫草木状》和《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中的犀牛图像可能源自较早的《食物本草》。从犀牛图像上看,《本草品汇精要》又很可能借鉴了《异域图志》,不过在绘制过程中将鼻梁长角的犀牛称为“胡帽犀”,添加了头顶犀角的犀牛图像且称之为“犀牛”。

在三类图像中,无论是从体态还是甲片等细节上看似牛类对犀牛的还原度最高,其原因可能



图7 1505年绘制的《本草品汇精要》中的插图

是这类书写者可能见到过活犀,加之宫廷各方资源繁多有能力获得更为真实详备的信息。

2. 似鹿的犀牛图像

图10为犀牛补纹,出自《大明会典》正德四年(1509年)版和万历十五年(1587年)版(A正德四年刊本;B万历十五年刊本),纹样已完全看不出犀牛本来的面貌。《大明会典》始修于弘治十年(1497年),正德四年李东阳重校后刊行,嘉靖八年(1529年)复修,增入弘治十六年以后事例。万历年间,又增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以后事例,万历十三年成书,十五年刊行。[12]两个时期刊本中的犀牛补纹基本相同,体态似鹿,万历版犀角由弯变直且多了纹路,犀牛上唇也由鸟喙式变为鹿唇式(图10-B)。《大明会典》是几代帝王倾举国之力编修的官方典籍,但犀牛重构情况比本草类书籍中的还要严重,《明史》记嘉靖三年鲁迷国进献犀牛,五年后开始复修《大明会典》,具有辨别功能的补纹是在朝臣工作中时常会见到的纹样,并非易于忽视的小事,然而嘉靖朝在复修《大明会典》时显然没有在乎补纹中的犀牛形象是否真



图8《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中的“犀牛”插图



图9《食物本草》中的“犀牛”插图

实,以及犀角到底长在哪里。

又或者,明代补纹中的犀牛在设定服制之初就已被“再造”,其描绘的并非真实犀牛,因而复修典籍时自然不会对犀牛纹有较大改动。补纹品级设立最晚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就已完成([13], p.136),“公、侯、驸马、伯用麒麟、白泽……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九品犀牛,海马。”([14], p.77)嘉靖十六年(1537年)改定八品武官服犀牛补。今虽很难见到犀牛补实物,但修《大明会典》时若想找洪武时期犀牛补还不是件难事,因而除非弘治帝或正德帝重创补纹(官方典籍中并无此类事件记录),不然正德版犀牛纹与洪武时期应相差不多。此外,在编修、校改《大明会典》期间《精要》和《食物本草》已经完成,二者中的犀牛形象仍差别如此之大,也说明《大明会典》描绘的很可能是明初就定下的补纹。武官实际服用的犀牛补并未完全采照《大明会典》,图11即源自一方缂丝犀牛补



图10《大明会典》中的犀牛花样

中,图中犀牛体态似羊,仍与真实犀牛相去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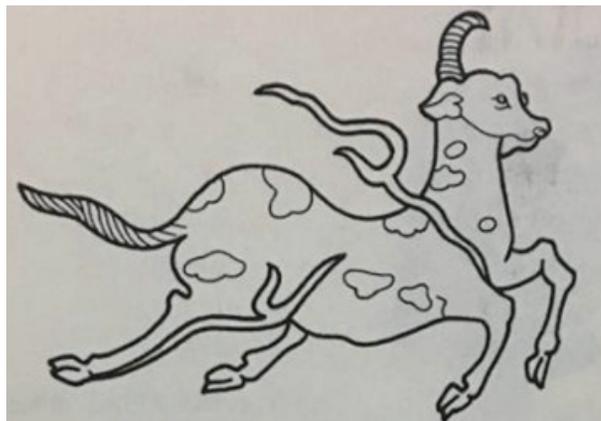


图11 明缂丝犀牛补上的犀牛

3. 似猪的犀牛图像

这类犀牛图像见于万历十年刊本的《新刻太乙仙制本草药性大全》(图12-A)和万历十五年刊本的《本草纲目》(图12-B),两个文本中的犀牛皆头顶一角,一个头型似猪,一个体态似猪,显然是受《尔雅》中“犀,似豕”的影响。



图12“犀角”和“犀”插图

明代并非所有文本都不“识”犀牛真面目,马欢曾随郑和下西洋见到过真实的犀牛,并记录在《瀛涯胜览》中,“其犀牛如水牛之形,大者有七八百斤,满身无毛,黑色,生鳞甲,纹癞厚皮。蹄有三,头有一角,生于鼻梁之中,长者有一尺四五寸。不食草料,惟食刺树刺叶,并食大干木,抛粪如染坊黄栌楂。”([9], p.10)但明代像这样准确记录犀牛形象的文本少之又少,古时信息传播速度慢、传播途径少,如马欢这般的言论在当时似乎并未起太大作用。

结 语

犀牛图像失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汉唐间犀角位置开始错乱,进而至宋代犀牛体态完全变形。其中原因可能有两层,首先犀牛生活区域南移和数量减少使得书写者难以见到真实犀牛,对其形象自然模糊不清。其次,正如尹吉男教授

所言知识存在生产现象,^[15]如唐代头顶一角的犀牛形象不断在宋明文本中出现,尽管书写者并未见过此类犀牛(因为现实中不存在这样的犀牛)。唐代(或者更早)书写者在特有知识背景下臆想出一个犀牛形象,后世书写者将其奉为“知识”不断扩散流传,当然扩散过程中还会添加自身理解,在这样一代代的书写者笔中便形成了关于犀牛形象的“知识”,这些“知识”积累至明代使得明代犀牛图像种类较多。补纹中的犀牛其实也是一种知识生产,武官补纹本应以凸显勇猛之气为主,明廷在有贡犀的情况下将魁梧的犀牛身体替换为纤巧的鹿身颇为矛盾,显然有其特定的知识生产规则。

此外,这种层层叠加下的犀牛形象与现实相距甚远,使得书写者见到真实犀牛时迫于认知压力,往往仍认为传统观念中的错误犀牛是真实存在的,这可能就是头顶长角或三角犀牛形象在明代依旧出现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 刘洪杰. 全新世的中国犀类及其地理分布[J]. 动物学杂志, 1993, (6): 37-42.
- [2] Hunter, I. 'Mutant Black Rhinoceros Has THREE Horns: Extremely Rare Animal Spotted in Namibia with Bizarre Defect' [EB/OL].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380358/Mutant-black-rhinoceros-THREE-horns-Extremely-rare-animal-spotted-Namibia-bizarre-defect.html>. 2015-12-31.
- [3] 班固. 王莽传[A], 张元济. 百衲本二十四史[C], 第四卷,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37, 1254.
- [4] 范晔. 孝和孝殇帝纪[A], 张元济. 百衲本二十四史[C], 第五卷,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37, 87.
- [5] 郭璞注. 尔雅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28.
- [6] 尚志钧. 本草经集注[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4, 412-413.
- [7] 何正璜. 石刻双狮和犀牛[J]. 文物, 1961, (12): 48-50.
- [8] 李云泉. 明清朝贡制度研究[D]. 广州: 暨南大学, 2003, 115.
- [9] 马欢著、万明. 明本《瀛涯胜览》校注[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44.
- [10] 侯倩. 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明刊《异域图志》考[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8, 33(4): 155-157.
- [11] 郑金生. 食物本草[A], 中国文化研究会: 中国本草全书[C], 第二十七卷,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1-4.
- [12] 原瑞琴. 《大明会典》版本考述[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1, 181(1): 136-140.
- [13] 王渊. 补服形制研究[D]. 上海: 东华大学, 2011, 77.
- [14] 明太祖实录[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实录[C], 第二百九卷,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62, 3113-3114.
- [15] 尹吉男、黄小峰. 美术史的知识生产——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访谈[J]. 美术研究, 2016, (5): 8-12.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